



贝写的《权力的餐桌》一书所述，“菜”不仅仅是菜，“吃”也不是个人的事儿，因为在吃的“规矩”和“意义”背后，总有需要达成的目的。在官员的酒局里，也常常隐藏着官与商心照不宣的交易。在觥筹交错间官商勾结，在推杯换盏中卖官鬻爵。正是在这种“无酒不上桌”“无酒不干事”的政治生态下，腐败滋生蔓延。

“能喝半斤喝八两，这样的干部要培养；能喝八两喝半斤，这样的干部要当心；能喝白酒喝红酒，这样的干部要调走；能喝红酒喝饮料，这样的干部不能要；能喝饮料喝白水，这样的干部要让位。”从民间诸如此类层出不穷的“敬酒令”“不难发现，在腐败的官场文化中，喝酒成了爬上官位的必备素养。从十八大以来查处的一系列贪腐案件显示，众多贪腐官员的落马的“绊马索”，正是在这一场场异化的酒局中的权钱交易、权色交易。

吉林省原副省长谷春立，2015年8月因涉嫌严重违纪被中央纪委立案审查。据大型电视专题片《永远在路上》介绍，从2015年到谷春立案发这半年的时间内，他多次接受公款宴请，包括出入私人会所大吃大喝，次数达到了三四十次之多，地点大多数都是不对外经营的内部场所。

谷春立在内心深处对于这样的吃请并没有当回事儿：“规定是肯定学了，但是有时候氛围整得融洽一些，我也觉得，有时在酒桌上协调点事，能够增进一些感情相互了解，所以协调起来工作比较方便。”

“一吃喝就高兴，挺风光，有一种成就感，一看下面敬你一杯酒，

包括老谷也那样，敬你一杯酒，你就忘乎所以了。”王树森当时担任吉林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，也因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。他经常为谷春立安排各种饭局，也一起参与吃喝应酬。

广州市白云山的“品云轩”，曾是广东省委原常委、广州市委原书记万庆良的“秘密据点”。他曾经出入此会所70次之多，就在他落马前两天，他还在这家餐厅与老板们大吃大喝，影响恶劣。万庆良吃喝玩乐的费用，都是由企业老板买单。2014年6月，万庆良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，接受组织调查。

安徽省政协原副主席韩先聪，自2013年1月任省政协副主席以来，多次出入高档酒店和私人会所接受党政干部、国企老总、私企老板的宴请。在中央纪委对他宣布立案调查决定的当天，他的手机信息显示，当天他有两场饭局，中午晚上各一次。

天津市医药集团原党委书记、董事长张建津，2013年5月至2015年8月接受审查前，常常以商务接待为名，频繁出入高档酒楼，组织和接受公款宴请，甚至为了能“安全”地“喝上一口”，让人把茅台酒装在矿泉水瓶子里，玩起瞒天过海的把戏。

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：“作风问题有的看起来不大，几顿饭，几杯酒，几张卡，但都与公私问题有联系，都与公款、公权有关系。”

年轻人不再相信“酒局”

中国是人情社会，“酒”常常

成为活跃气氛、拉近距离、促进感情的催化剂。酒桌本身也可以是欢愉的，但酒局携带了权力和地位不平等的基因后，这个“酒”喝与不喝，成了一种服从性测试、一种诚意测试，那些逐渐被人为扭曲的“酒局”往往散发着恶臭。

随着“酒局文化”的频繁翻车，这一文化糟粕也正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唾弃。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更加注重自身感受，试图摆脱“酒桌文化”带来的人身桎梏，让“酒桌文化”回归酒的本质，还原到最初的“酒文化”。对于他们来说，只要不为功利，就能找到喝酒的快乐。

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曾对109441名青年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，35.7%的受访者每月要参加三个及三个以上的酒局，84.0%的人直言反感当下酒局文化。在中国新闻周刊发起的“年轻人有多反感酒局文化”的微博投票中，超50万名网民表示，“极为反感，不能接受”。

他们反对“酒局文化”，实际就是支持更透明的规则，更尊重个人技能。工作要靠能力，而不是靠喝酒，不需要通过酒桌来刷存在感。实际上，在一些市场主导的职场领域里，游戏规则已经改变，酒局文化正悄然式微。

目前，相对年轻化的职场环境中“酒局文化”并没有那么流行，但仅仅是撤掉饭桌上的酒是不够的，如果等级秩序和权力游戏的规则不改变，还会有这样那样的“局文化”出现。面对潜规则，只有更多的人站出来，只有更多的人说不，潜规则存在的土壤才可能被铲除。■